

# “教什么”比“怎么教”更重要

□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 陆青春

“教什么”是指教学内容。我们备课时,必须具体到给每一节课(教学内容)制定恰当的教学目标;而“怎么教”是指教学方法,比如如何处理预设与生成的关系、如何导入新课、如何突出教学主线、如何进行有效拓展等。

打一个比方:“教什么”是我们要去的地方,“怎么教”是到达这个地方所采用的交通方式,如步行、骑车、开车等。

如果我们连要去的地方都没搞清,那么无论出行方式怎样豪华、快速,能到达目的地吗?显然不能。“南辕北辙”的故事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。

反观我们平时参加的教研活动,大多聚焦于教学方法,即对“怎么教”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,而“教什么”的问题往往被轻视和忽略。

教研的误区在于:大家都觉得,“教什么”还用研究吗?教学内容明明白白都写在教材上,教师只需按部就班、老老实实地教给学生就行了。

可教学内容真的只有教材吗?《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》明确提出了“用教材教”而不是“教教材”的主张。这就说明,“教什么”在课程中、教材中、教参中有大致的方向,但都没有具体明确,其实,是不能过于明确。

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曾说,一堂好课的最低标准是要有适宜的教学内容。

“教什么”应该以生为本,即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为基础,在最近发展区内组织教学内容。只要是能够提高素养、启迪思想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点,都可以作为“滋养品”在课堂上提供给给学生。

哲学中有“内容决定形式,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”的说法,体现在教学中就是,如果教学内容选择不当,即使形式(教学方法)再精致、再精彩,课堂的气氛再热烈、再活跃,也很难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。

反之,如果教学内容是学生最需要、最感兴趣的,即使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原始,学生往往也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。

先有内容,后有形式,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

我曾听过一节讲杜牧《山行》的公开课。这节课的课件做得漂亮极了,教师用AI生成了一幅很美的画:一条被红叶掩映的曲径通向山顶,山顶的云朵底下有一座白墙黑瓦的房子。整节课,教师就是对着这幅画在讲。

可这就把学生的想象力限制死了。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这叶子有多红?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,这山有多高?我想,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发挥想象,在脑海里描绘出这首唐诗的画面,就像我们当初上这节课的时候一样,训练学生对诗歌的意境感知能力。

一旦教学把想象的无限框定在那么狭小的画面里,即使画面再美,教学的意义也会急剧萎缩。

因此,教学内容的鉴别力与建构力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。要拥有这种能力,需要教师像地质学家般深入文本“岩层”,挖掘最具营养价值的语言“矿脉”。

一是依据课程标准。课程标准是教学的纲领性文件,它规定教学的目标、内容和要求。因此,在确定“教什么”时,教师必须以课程标准为依据,确保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。

二是分析教材特点。教学内容的建构有定规,并非可以为所欲为。以语文学科为例,教学内容的建构要因文制宜:有的课文语言有特色,有的课文表现手法巧妙,有的课文内容新颖、思想深刻……这都需要教师深入地钻研,理解编者意图,结合本班学生实际,建构最有效的教学内容。在建构过程中还需要运筹帷幄、有大局观,因为每篇课文都不是独立的,而是融合在各个单元里。除课文的特点外,对课文在这个单元中的地位、价值,教师也需仔细琢磨、推敲。

三是关注学情差异。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和对象。在确定“教什么”时,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学情差异和个性需求。通过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、兴趣爱好、学习风格等方面的差异,教师可以更加精准地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,使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和认知水平。

四是结合时代要求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教育也在不断地变革和发展。在确定“教什么”时,教师需要关注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求。通过了解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,教师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教学的方向和目标,使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当“教什么”真正触及精神内核、学生的心灵深处、学科的本质规律时,“怎么教”便不再是刻意雕琢的技巧,而是教学内容自然流淌的艺术。这,才是教学的本真之道。

这种现象的发酵,与数字陵国的逻辑如出一辙。“一键祈福”“转发求过”等行为本就带有强烈的即时心理慰藉属性。当这种思维被移植到线下,叩拜先贤塑像便从“表达尊崇”简化成了“求分数加持”的快捷方式。

或许最初那个祭拜的学生是出于自发的敬意。然而一旦“某人拜了有效”的段子流传开来,通过当下社交平台的传播放大,立刻会引来大批跟风者,最终只剩下“考前抱佛脚”的功利诉求。

葛永锋

一到考试季,部分学生感到“压力山大”,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,吃不香睡不着,到先贤塑像前叩拜,祈求保佑自己考出好成绩。

孔子和陶行知作为教育家,在学生的认知中他们自带与学习、考试相关的标签。叩拜行为本质是学生缓解焦虑、寻求心安的一种心理暗示。

假如这些是个别学生的行为,也属正常。倘若叩拜成风,应该引起学校和家长的重视,因为这暴露出塑像育人功能的表面化、浅层化、功利化。

幸福是奋斗出来的,而非运气加持,成功是等不来的,也是求不来的。要想考取好成绩唯有长期坚持,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

yhglll

这种现象的发酵,与数字陵国的逻辑如出一辙。“一键祈福”“转发求过”等行为本就带有强烈的即时心理慰藉属性。当这种思维被移植到线下,叩拜先贤塑像便从“表达尊崇”简化成了“求分数加持”的快捷方式。

或许最初那个祭拜的学生是出于自发的敬意。然而一旦“某人拜了有效”的段子流传开来,通过当下社交平台的传播放大,立刻会引来大批跟风者,最终只剩下“考前抱佛脚”的功利诉求。

龙泉许东宝

心中有先贤,贵在付诸行动。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生活成果,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劳动与付出。倘若靠考前突击叩拜就能提高分数,那我肯定第一个去试。

就拿今年的第一天来说,我就把学校足球队集中起来训练,目的就是告诉队员们:体育没有捷径,更容不得投机取巧,唯有练到位、训到位、赛到位,才能取得成绩,而且有可能只是一点点成绩。

唧唧先生

叩拜先贤塑像以求得好成绩,本质上是一种迷信行为,不宜提倡。但学生偶尔为之,倒也不必反应过度。不少学生只是抱着一种玩玩的心态,事后往往一笑置之,并无执念。

葛永锋

学校要自检:有没有通过系统活动、文化解读等途径让塑像传递先贤精神,学生有没有从塑像中汲取成长力量?

学校理应有更多、更有用的办法对应考、备考阶段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,引导学生学习先贤精神。

先贤文化往往承载着治学态度、育人理念等核心价值,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为广大师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这些隐性的课程,需要学校创设载体,通过文化解读、活动引导、课程融合,让塑像承载的先贤精神成为激励学生勤学善思、求真务实的内在动力。

赵占云

其实学生心里都清楚,叩拜先贤塑像对实际考试成绩并没有任何作用。他们更多是通过这种行为进行自我暗示,以调整应考心态。

教师们常说:“只要用平常心去考,就能发挥出好水平。”因此,学生在考前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,比如“我已尽力,一定能发挥出正常水平”,确实有助于极大缓解考试前的压力和焦虑。

既然如此,我们不妨将这种“仪式”视为学生寻求心理调适的一种方式,一种带有积极向上意味的自我激励,不必过度解读。对此,采取“不反对、不提倡”的态度,或许更为妥当。

教师论坛

中国教育期刊优秀作品评选金奖栏目

本话题可继续探讨——

## 班级事务盲盒

□桐乡市中山小学 鲍晨旭

“今天的盲盒里藏着‘神秘任务’,看谁能抽到最特别的那个?”每周一的早读课开始前,我总会抱着一个彩色纸盒走进教室,说出这句话。原本还在整理课本的学生立刻坐直身子,眼睛亮亮地盯着纸盒,连平时最不爱参与班级事务的小宇都悄悄地举起了手。

这个纸盒就是我们班的“班级事务盲盒”,里面装着写满任务的纸条——擦黑板、整理图书角、给植物浇水、管理课间纪律、检查桌面整洁度……

在这个盲盒出现之前,班级事务分配一直是个难题。学生们不是抱怨“不公平”,就是敷衍了事;我每天忙得团团转,盯着落实各项事务,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图书角常有图书乱放、封面折角的情况;植物角的多肉更是因为没人记得浇水,蔫了好几盆。

直到有次路过文具店,看到学生在围着盲盒挑选,我突然有了灵感:何不把班级事务变成“盲盒任务”,既解决分配公平的问题,又能让枯燥的责任变得有趣?

第一周推行时,盲盒里的纸箱上只有简单的图案:小黑板(表示擦黑板)、小树苗(表示管理植物角)……学生排队抽取,每打开一张纸条,教室里就会响起一阵小声的欢呼或惊叹。

小轩抽到“图书管理员”,兴奋地跟同桌说:“我终于能整理那些漫画书了!”

平时调皮的小浩抽到“课间纪律员”,愣了一下,随即挺直腰板说:“我肯定能管好!”

为让大家更有成就感,我还定制了小勋章:完成“图书管理员”任务的,颁发“图书守护星”勋章;把植物养好的,会拥有“绿植小卫士”勋章。

周五的班会课大家投票选出“事务小能手”——不是选做得最好的,而是选最认真、最有进步的。

第一次获选的是小浩,他在课间主动提醒同学不追逐打闹,全票当选。拿到勋章时,他的脸都红了,紧紧攥着不肯松手。

变化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。以前需要我反复提醒“擦黑板”,现在抽到任务的学生,每天早自习前就会主动把黑板擦干净;图书角也不再是乱糟糟的;植物角的多肉不仅活过来了,还多了几盆学生从家里带来的绿萝,说“要让植物角更热闹”。

其实学生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,只是需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充满乐趣。



教无定法

## 一株吊兰唤醒学生的劳动心

□杭州市育才大城北学校 蓝海燕

在“双减”政策全面落地、劳动教育正式纳入新课标的背景下,杭州市育才大城北学校的教师们却一度陷入深深的困惑:为什么学生一上完劳动课就“收工”?为什么种下的豆子迟迟不发芽,学生便失去兴趣?为什么精心设计的劳动任务,在家庭生活中几乎无人延续?劳动教育,为何总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?

我对自己班的45名一年级学生开展了一次小范围调研,结果令人忧心:仅有28%的学生认为“照顾植物是重要的劳动”;78%的学生无法坚持记录植物生长情况超过一周;更有家长直言:“孩子连自己的书包都懒得整理,更别说照料一盆植物了。”

这些现象的背后,暴露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的三大问题:一是内容脱离学生认知特点——6~8岁学生以具象思维为主,但许多课程仍停留在“讲道理”层面;二是任务周期长、反馈慢——如播种豆类需7~10天才发芽,学生极易丧失耐心;三是缺乏持续性与责任感培养——劳动止于课堂,难以延伸到生活,更难以内化为习惯。

学校劳动教研组教师开始思考:有没有一种植物,既生命力顽强、生长情况可视,又操作简单、适合低龄儿童?常见于教室窗台、家庭阳台的植物——吊兰,成了破局的关键。

它分株即活,无须播种等待;气生根清晰可见,新芽每日微变;养护只需“每天浇水一次,每周记录一次”,轻负担却需坚持。

更重要的是,它能让当天看到新生命——剪下一株带根的小苗插入水中,第二天就能观察到根

系舒展,叶片挺立。这种即时反馈,契合低段儿童的心理需求。

于是,一个名为“吊兰的秘密花园”的劳动实践项目应运而生。我们逐步构建起“一核三环”劳动教育体系:以劳动核心素养为核,贯穿“认知—实践—评价”三环,让劳动从任务变为情感联结。

第一环:认知启蒙——从“好奇”走向“责任”。

课程伊始,教师并不急于动手,而是引导学生“看见生命”。学生围坐一圈,亲手触摸吊兰肉质根,用放大镜观察气生根如何“呼吸”,看动画了解“吊兰妈妈怎么生宝宝”。他们还模仿课文《植物妈妈有办法》一起创编儿歌《吊兰妈妈真聪明》:“吊兰妈妈真聪明,匍匐茎上结娃娃,剪下小苗插水里,天天长大笑哈哈。”朗朗上口的童谣,让抽象的生命繁衍变得可感可亲。

组建多个“吊兰养护小队”,明确分工:分株员负责剪取健康小苗,记录员绘制生长日记,养护员定时换水,创意设计花器标签。这让每个角色都有“被需要”的价值感。一个曾因不小心弄断吊兰根而自责的男生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每天轻轻浇水,今天它长出了小嫩叶。原来植物也有顽强的生命力。”

第二环:实践操作——从“动手”升级为“动脑”。

劳动教育,不止于“做”,更在于“思”。在分株环节,教师不直接示范,而是抛出问题:“为什么花盆要有排水孔?”“土壤太紧会怎样?”学生带着疑问动手:学习“三步分株法”——脱盆、消毒、定植;尝试水培与土培对比实验;甚至自制简易湿度计监测环境。

当一盆吊兰出现烂根,小组集会“会诊”:是水太多?是光照不足?还是容器不透气?通过观察、

讨论、查阅资料,98%的学生最终能准确判断叶片发黄的3种以上原因,并提出解决方案。更有学生发挥创造力,用废弃矿泉水瓶制作自动滴灌装置——瓶底钻孔,倒置插入花盆,实现缓慢供水。

第三环:多元评价——从“完成任务”转向“创造价值”。

评价机制也彻底革新。不再只看“植物是否存活”,而是关注过程、态度与成长。学校建立四维评价体系:学生自评(“我今天认真记录了吗?”)、同伴互评(“他提醒我换水,很负责。”)、家长点评(“学生主动给阳台上的所有植物浇水。”)、教师反馈(结合观察量表)。

成果呈现更是百花齐放:有人制作《我的吊兰成长绘本》,图文并茂记录种植42天以来的变化;有人拍摄3分钟科普短视频,讲解吊兰净化空气的原理;还有人将繁殖成功的吊兰赠予社区孤寡老人,并附上手写卡片:“这株小吊兰会陪您说话。”由此,劳动的价值从技能习得延伸至情感表达与社会责任。

成效令人振奋。项目实施12周后,94%的学生表示“看到吊兰长大有成就感”;96%坚持完整记录生长日志;家庭植物养护参与率从原来的19%跃升至100%。一位母亲在家长会上动情分享:“以前孩子做事三分钟热度,现在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量叶子长度、换清水,连弟弟妹妹都跟着学。”
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,这株吊兰成了“五育”融合的天然载体:语文课写观察日记,提升表达能力;科学课探究光照、水分对叶色的影响;美术课设计创意花盆与标签;德育课从吊兰的“逆境生长”(如缺水蔫叶后复壮)感悟坚忍不拔的精神……劳动不再是孤立的技能训练,而成为推动学生多元发展的肥沃土壤。

学校要积极利用校园景观传递先贤精神

——怎么看学生在校内叩拜先贤塑像(续)